

《春秋公羊传》之三世

李静^{1,2}

(1. 中山大学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 广东 广州 510275;
2. 中山大学 人文科学学院, 广东 广州 510275)

摘要:通过回溯《公羊传》里“三世异辞”的脉络,经由汉代董仲舒与何休等人的疏解,明确三世的要旨,从时间与义理两个层面重新把三世放回三统之中,以恢复三世说的本来面目。这一“恢复”有两重意义:一是澄清三世的含义,明了世与统的关联,拒绝以三世来独立描述《春秋》的历史时间;二是将三世重新放回三统之中,进化含义相应减轻,而三统中的承续意义便凸显。以三统观三世,旨在技术时代重新理解奉天法古之意,这对于重今天之“进步”而轻古今“承续”的现代思维有警醒作用。

关键词:三世;王法;三统;《春秋公羊传》;《左传》;《穀梁传》

中图分类号:B22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6248(2013)04-0058-06

清末民初,各种变法思想竞相交织,戊戌变法虽昙花一现,康长素(康有为)却因此声名鹊起。身为清代公羊学的一员大将,康长素用公羊学来支撑戊戌变法,其中三世说就被用作改革的有力工具。他以三世说为底本,勾勒出中国乃至世界历史演进的方向: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并以此来对应近代西方各种政治体制,乱世行君主专制,升平世行君主立宪制,太平世行民主共和制^[1]。如此一来,公羊学之三世竟与近代西方流传的历史进化论不谋而合。康长素之后,不少学人纷纷沿着他的路子,或依靠公羊学或依靠进化论,来拆分或组合中国思想史与政治史^[2],公羊学三世的真正内涵反而黯然。难以想象,孔子在两千多年前便埋藏好进化微言,迟至清代康长素才得以解密。康长素称孔子之道在六经,六经统一于《春秋》,《春秋》三传之中又以《公羊传》为要,要学懂《公羊传》,舍董子无他人^[3]。康长素此话虽有些夸张,却也告诉我们,若想明白三世之端委,必得循公羊学传注之路。

一、三世异辞

《春秋》主要有三传,《左传》长于事,《公羊传》和《穀梁传》长于义。^①三传之中,只有《公羊传》(以下简称《传》)谈到三世,总共出现3次,且3次同辞:

隐公元年,公子益师卒。传曰:何以不日?远也。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

桓公二年,三月,公会齐侯、陈侯、郑伯于稷,以成宋乱。传曰:内大恶讳,此其目言之何?远也。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隐亦远矣,曷为为隐讳?隐贤而桓贱也。

哀公十有四年,春,西狩获麟。传曰:何以

^① 北宋蜀人苏轼作《春秋苏氏传》,哲宗年间胡安国著《春秋胡氏传》,均各有造诣,不过都是择取三传为之。通常所谓《春秋》传,主要有传,邹氏无师,夹氏无书,因而只有《公羊》、《穀梁》和《左传》流传下来,它们成书早,去古未远,且有较明确的师说。

书,记异也。《春秋》何以始乎隐?祖之所逮闻也。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①

《传》文3次谈到三世异辞,每回又3次重复“异辞”二字。子曰:“书之重,辞之复,呜呼!不可不察也。其中必有美者焉。”^[4]但凡《春秋》经传中用辞相同、重复出现的,其中必有可观之处,不可不慎重。隐公元年言三世异辞,旨在解释鲁国大夫之卒记日不记日的问题,隐公二年则旨在解释不为桓公隐讳的原因,两次都以“远也”引出,暗示我们“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跟时间远近有关。哀公十四年提到三世异辞,则是为了解释《春秋》为什么从隐公开始书写,《传》文说这是父祖所能知道的最远时代的事情,再远的就没法听闻了。同样在说时间“远”。隐公、桓公离谁“远”?文意当指书写的作者,即孔子。《春秋》十二公之中,隐桓之世离孔子所处时代最远,所以大夫卒不记日,桓公行恶不隐讳。这三处事例或在《春秋》之始,或在《春秋》之终,按照《传》文“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直指离孔子所处时代之时间远近不同,书写的文辞也相应有所不同。^②至于怎么不同,为什么要有这样的书法,《传》文没有给我们更多的信息,不过,我们可以从董子、何邵公处获得进一步的理解。

董子进一步解释三世异辞:

《春秋》分十二世以为三等,有见,有闻,有传闻。有见三世,有闻四世,有传闻五世。故哀、定、昭,君子之所见也。襄、成、文、宣,君子之所闻也。僖、闵、庄、桓、隐,君子之所传闻也。所见六十一年,所闻八十五年,所传闻九十六年。于所见微其辞,于所闻痛其祸,于传闻杀其恩,与情俱也。是故逐季氏而言又雩,微其辞也。子赤杀,弗忍书日,痛其祸也。子般杀而书乙未,杀其恩也。屈伸之志,详略之文,皆应之。吾以其近近而远远,亲亲而疏疏也,亦知其贵贵而贱贱,重重而轻轻也。有知其厚厚而薄薄,善善而恶恶也,有知其阳阳而阴阴,白白而黑黑也。百物皆有合偶,偶之合之,仇之匹之,善矣。……是故于外,道而不显,于内,讳而不隐。于尊亦然,于贤亦然。此其别内外、差贤不肖而等尊卑也。义不讪上,智不危身。故远者以义讳,近者以智畏。畏与义兼,则世逾近而言逾谨矣。此定哀之所以微其辞^[4]。

首先,董子明确了三世所指,隐、桓、庄、闵、僖为一世,为所传闻;文、宣、成、襄为一世,为所闻;昭、

定、哀为一世,为所见。^③其次,董子扩展了三世之例,还解释了划分十二公为三世的根据——“与情俱”,具体可以分为两个层面。《春秋》按时间远近来组织文辞,实质是与人情亲疏厚薄紧密相连,人情莫不亲近疏远,与此相应,三世文辞也伸近屈远、详近略远,近者恩厚,所以文辞更详细,远者恩少感情薄,文辞也相对简略,这便是“近近而远远,亲亲而疏疏”,此其一。由亲近疏远往上延伸,又可以判断贵贱、轻重、厚薄、善恶,以至于白黑、阴阳:以智言,则近贵而远贱,近重而远轻,近厚而远薄;以义言,则善其善而恶其恶,白其白而黑其黑,这便是合偶仇匹之道。水至清则无鱼,天下万物莫不白白而黑黑,阳阳而阴阴,没有尽善尽美,也不会尽恶尽丑,此其二。运用于《春秋》三世,所传闻世远而疏,所以杀恩,以义断事,因此桓公二年成宋乱书而不隐,庄公三十二年子般卒书日,恩情少故稍减不忍之心;所闻世恩稍进故而痛其祸,文公十八年冬十月子卒,不记日,不忍说之故;在所见之世,恩义重,以智行笔,言辞愈加谨慎,定公元年《传》云:“定、哀多微辞,主人习其读而问其传,则未知己之有罪焉尔。”在此,董子言三世只谈到文法,确切地说是以时间远近为标准,判断人情厚薄,以此决定行文详略、避讳深浅。董子又曰:

孔子曰:“吾因行事,加吾王心焉,假其位号,以正人伦,因其成败,以明顺逆。”故其所善,则桓文行之而遂,其所恶,则乱国行之终以败。故始言大恶杀君亡国,终言赦小过,是亦始于麤粗,终于精微,教化流行,德泽大洽,天下之人,人有士君子之行而少过矣,亦讥二名之意也。(《俞序第十七》)

孔子著《春秋》为的不只是纪事,关键在于“加吾王心”来正人伦。孟子曰:“世道衰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5]孔子

① 文中所引《公羊传》文,大都源自刘尚慈译注《春秋公羊传译注》,中华书局,2010年版。

② 另外,廖平认为,“异辞”表达了所见、所闻、所传闻各世的书法不同,综合《公羊传》的内容,的确有一定道理,但这涉及到事同辞异的问题,与此处《传》文三例似无明显关系,详情参见廖平《何氏公羊解诂三十论》,见北京大学《儒藏》编纂与研究中心编,《儒藏·精华篇·八五》,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③ 公羊家都把《春秋》十二公分为三世,但具体断自哪里有分别,一般都遵循董子、何邵公的分法,然汉代颜安乐以为,从襄公二十一年至孔子去世,当为所见世,略有不同;另外,郑玄以《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为限,平均八十一年为一世,别有解法。

生逢周代，看到世道衰微，邪胜于正，担心大道不行，于是才写下《春秋》，但孔子有德无位，不能直接制定王法，因此要避嫌，这才借着齐桓晋文之事加“王心”。“王心”具体怎么加？这便是董子所说的“始于麤粗，终于精微”。微妙之处在于，这里的“麤粗”与“精微”不再谈由远及近、由疏及亲的过渡，而把重点放在从“大恶”到“小过”的进展。《春秋》一开始多谈大恶、杀君亡国之类，最后却连小过错也不忍心写，只轻轻写着“讥二名”。定公六年的仲孙何忌、哀公十三年的晋魏曼多，都以两个字为名，《传》曰：“讥二名。二名，非礼也。”《传》文只说用两个字来作为名的，不合礼义，却不曾言及三世。“讥二名”本是小过，所传闻与所闻世未必没有，却不见《春秋》讥刺，到了定哀之世，才开始“讥二名”、“赦小过”，为何？董子把“讥二名”与“德泽大洽”联系在一起，似在说定哀之世德教大兴，人人都有士君子之风，当然就没什么过错，只得写“二名”这类小过。

不过，据《春秋》所写的史事，定哀时期恰恰混乱，王室衰微，晋齐内乱而无暇顾及其他，诸侯以力争，战不以义，伯莒之战吴趁机入楚，盗窃宝玉大弓，陪臣甚而执国命，如此乱世，似很难理解为“德泽大洽”。董子点到为止，除了猜测，我们很难得到更清晰的说法，因此，我们要进一步借助何邵公的解释。

二、三世王法

迨至何邵公，三世之义有了新的进展。^①《传》讲三世的三例中，首条“隐公元年公子益师卒”下，何休花了最大篇幅来阐说，最完整地表达了三世之义：

所见者，谓昭、定、哀，己与父时事也；所闻者，谓文、宣、成、襄，王父时事也；所传闻者，谓隐、桓、庄、闵、僖，高祖曾祖时事也。异辞者，见恩有厚薄，义有深浅，时恩衰义缺，将以理人伦，序人类，因制治乱之法，故于所见之世，恩己与父之臣尤深，大夫卒，有罪无罪，皆日录之，“丙申，季孙隐如卒”是也。于所闻之世，王父之臣恩少杀，大夫卒，无罪者日录，有罪者不日略之，“叔孙得臣卒”是也。于所传闻之世，高祖曾祖之臣恩浅，大夫卒，有罪无罪皆不日略之也，公子益师、无骇卒是也。于所传闻之世，见治起于衰乱之中，用心尚麓桷，故内其国而外诸夏，先详内而后治外，录大略小，内小恶书，外小恶不书，大国有大夫，小国略称人，内离会书，外离会

不书是也。于所闻之世，见治升平，内诸夏而外夷狄，书外离会，小国有大夫，宣十一年“秋，晋侯会狄于攒函”，襄二十三年“邾娄鼻我来奔”是也。于所见之世，著治太平，夷狄进至于爵，天下远近小大若一，用心尤深而祥，故崇仁义，讥二名，晋魏曼多、仲孙何忌是也。所以三世者，礼为父母三年，为祖父母期，为曾祖父母齐衰三月，立爱至亲始，故《春秋》据哀录隐，上治祖祢。所以二百四十二年者，取法十二公，天数备足，著治法式，又因周道始坏绝于惠、隐之际^[6]。

至此，三世之名才终于尘埃落定。何邵公自称依照胡毋生《条例》阐发《传》意，几乎每一条每一款下都有注解，由此把《传》推向新的高度。具体来说，何邵公在如下几点再次推进了三世说：第一，进一步把《春秋》十二公和作者与闻的时间对应起来，所见世指的是己与父时事，所闻世谓王父时事，而所传闻世则指高祖曾祖时候所闻之事；第二，何邵公注里明确谈及三世的就有十几条，大大扩展了三世说的体例；第三，进一步明确三世异辞的原因，恩有厚薄，义有深浅，此承接董子之说，此外，还补充新的论据，“礼为父母三年，为祖父母期，为曾祖父母齐衰三月”，以此来表达“立爱至亲始”、“躬自厚而薄责于人”^[6]的三世之序，加强了亲近疏远这个理由；第四，新颖之处在于，何邵公说三世，不但包括亲疏远近，还贯之以内外之别，最为重要的是三世有了明确的进展次第，即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这样便把所见、所闻、所传闻这远近三世与中国、诸夏、夷狄之内外，据乱、升平、太平三种治理景象勾连起来，三世的内容因此大为丰富。

据何邵公，孔子的“用心”由麓桷到深详，旨在说明“治乱之法”，具体分为据乱世、升平世和太平世3个阶段。“治乱之法”如何理解？《传》云：“拨乱世，反诸正，莫近诸《春秋》。”孔子自谓《春秋》是借齐桓晋文之事而“加乎王心”^[4]，董子云《春秋》“缘鲁以言王义”（《奉本第三十四》），《儒林传序》云“故因史记作《春秋》，以当王法”，何邵公在此也说孔子作《春秋》就是制定“治乱之法”，为的是“理人伦，序人类”，凡此种种都意在说明《春秋》行的是王法，因此，“治乱之法”当为王法。如此王法不可

① 此后，学人们基本都延续董子、何邵公的阐释，各有增减，但大义无出其右，当然，清代也有人抛开汉代学人，直抒大义，自成一统，但多半不被学人接受，本文旨在沿着董子、何邵公的注疏之路理解公羊学，其他自成体系者在此不予赘述。

能一蹴而就,得依时进行,这样就把“治乱之法”与三世联系起来。具体而言,王法实行分为3个阶段,所传闻世内中国而外诸夏,世为衰乱,所闻世内诸夏而外夷狄,世在升平,而所见世夷狄进至于爵,天下远近大小若一,世进于太平。

如此一来,董子所谓“教化流行,德泽大洽,天下之人,人有士君子之行而少过”便明朗起来,这说的是所见世的太平景象,无怪乎董子言“德泽洽而国太平”(《通国身第二十二》)。何邵公不是不知道定哀年间局势混乱,不堪太平,正如襄二十三年和定六年注里所言,这只不过是“取足张法”、“文致太平”而已。张法要“取足”,就得依三世次第而行,最后又得成就太平景象,所以《春秋》功成之后,仁兽麒麟来应。《传》曰:(《春秋》)何以终乎哀十四年?曰,备矣。何邵公注曰:“人道浹,王道备”。董子云:“《春秋》十二世之事,人道浹而王道备。”何邵公进而把“人道浹,王道备”用于解释三世,解释孔子“王法”之“备”。孟子云:“《春秋》,天子之事也。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膺戎狄、驱猛兽而百姓宁,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7]尧舜功成,凤凰来,《春秋》著成,拨乱反之正,王者之治定,吴楚进,甚至戎曼也进爵为“子”,此所谓王道太平。《中庸》言王天下有三重,虽善若无徵民终不会信服,因此太平需要祥瑞,西狩获麟,麟来作为效应,以此,《春秋》能够文致太平,成就王法。

三、三世在三统之中

经过董子、何邵公的阐释,三世旨意由于与王法的结合而变得清晰。虽则何邵公一再声明三世只不过是文法,然则衰乱一升平一太平,这样的进化顺序无论如何使人联想到现代的进化史观,公羊三世之说离康长素的三世说果真只一步之遥?

《春秋公羊经传解诂隐公第一》:……问曰:《春秋说》云“《春秋》设三科九旨”,其义如何?答曰:何氏之义,以为三科九旨正是一物,若总言之,谓之三科,科者,段也;若析而言之,谓之九旨,旨者,意也。言三个科段之内,有此九种之意。故何氏作《文谥例》云:“三科九旨者,新周故宋,以《春秋》当新王”,此一科三旨也;又云“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二科六旨也;又“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是三科九旨也^[6]。

根据徐彦引《文谥例》的说法,何休明确谈到

《春秋》有三科九旨,即新周、故宋、以《春秋》当新王,此即宋均所说存三统,何邵公所谓一科三旨,位列三科九旨之首;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宋均称为张三世,此为何邵公之二科六旨;最后,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以及文中没有说明的远近大小若一,宋均称为异外内,此为何邵公之三科九旨。三科九旨虽各有所指,却并非不相关,何邵公说三科九旨“正是一物”。如何理解这个“正是一物”?何邵公谈三世异辞时候,已经把内外之别放到三世之中,从而所传闻与内中国相应,所闻与内诸夏相应,而所见与夷狄进爵相应,以此,别外内与张三世相互印衬。不过,三统与三世是何关联呢?

通三统这一科内有三旨:新周、故宋、以《春秋》当新王。限于篇幅,仅各举一例以作说明:

宣公十六年夏,成周宣谢灾。《传》云:成周者何?东周也……外灾不书,此何以书?新周也。注云:新周故分别灾,不与宋同也。孔子以《春秋》当新王,上黜杞,下新周而故宋,因天灾中兴之乐器,示周不复兴,故系宣谢于成周,使若国文,黜而新之,从为王者后记灾也。

隐公三年,宋公和卒。注:宋称公者,殷后也。王者封二王后,地方百里,爵称公,客待之而不臣也。

庄公二十七年,杞伯来朝。注:杞,夏后,不称公者,《春秋》黜杞,新周而故宋,以《春秋》当新王。黜而不称侯者,方以子贬,起伯为黜。

《春秋》上黜杞、故宋而新周,下以《春秋》当新王。三统之中,《传》文明明确提到的只有“新周”,而故宋、以《春秋》当新王则多存于董子、何邵公的注解中。据何邵公,“新周”并非以周为新王,相反是“黜周”,《春秋》外灾不书,但为王者之后记灾,周为时王,周灾本不应该记录,但《传》认为《春秋》有新王之义,所以得黜周以为二王后,与“故宋”的意义相同,都旨在法古。

《春秋》一方面黜周为二王后,另一方面则托鲁为新王。“孔子之时,上无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断礼义,当一王之法。”(《汉书·司马迁传》)天无二日,国无二王,所谓“托鲁为王”,并非真是鲁侯行天子之权,实则为孔子文法,缘鲁以言王义:“夫子以匹夫行褒贬之权,不可无以藉,故托鲁为王,以进退当世士大夫,正以载之空言不如行事之深切著明也。”^[8]托鲁为王,指孔子以鲁国为依据,先“自详正”,借此来讲述拨乱反正的王法,因此托鲁为王也就是“以《春秋》当新王”。

至此，三统与三世的关联露出水面。《文溢例》^①云：“此《春秋》五始、三科、九旨、七等、六辅、二类之义，以矫枉拨乱，为受命品道之端，正德之纪也。”^⑥按何邵公所言，三科九旨都要矫枉、正德、拨乱反正，是受天之命重返正道，这正是“以《春秋》当新王”之意。就三统而言，“以《春秋》为新王”本就是其中一旨。董子云：“《春秋》上黜夏，下存周，以《春秋》当新王。《春秋》当新王者奈何？曰：‘王者之法，必正号，黜王谓之帝，封其后以小国，使奉祀之。下存二王之后以大国，使服其服，行其礼乐，称客而朝。故同时称帝者五，称王者三，所以昭五端，通三统也……’《春秋》作新王之事，变周之制，当正黑统。”（《三代改制质文第二十三》）董子把《春秋》直接解释成三统中的黑统，自然是“以《春秋》当新王”。就三世而言，我们在“三世王法”部分就已经谈到《春秋》用三世来讲王法，隐公元年“公子益师卒”条下，何邵公说三世异辞为的是“理人伦，序人类，因制治乱之法”，这加了“王心”的治乱之法自然就是王法。三世之中，所见世“德泽大洽”的太平景象实际是文致太平，自然不是指的王室已乱的成周，以此，三世异辞也旨在“以《春秋》当新王”。

概括而言，三统有新周、故宋、以《春秋》当新王3个旨意，而三世的旨意也恰在讲述王法之渐，同样意在说明“以《春秋》当新王”。具体而微，三统之中，“新周”和“故宋”重在谈法古，而“以《春秋》当新王”则重在讲改制。新王奉天命当王，有行王法的次序，先“自详正”，所谓“躬自厚而薄责于人”，所以“内大恶讳”，此为内中国而外诸夏，衰乱世之义；自正然后正人，正人有序，“从近者”始，此即襄公二十三年“邾娄鼻我来奔”，《传》文“以近书”之意，此为内诸夏而外夷狄，升平世之义；最后，正人由近及远，最终达到夷狄进诸爵，因此昭公十六年戎曼子称“子”，吴进爵称“子”，至此王化大渐，德泽大洽，《中庸》所谓“凡有血气，莫不尊亲”之意，此为远近大小若一，人皆有士君子之行，太平世之义。

《春秋》三世总十二公，共242年，始于隐公“元年春王正月”之新王改制，终于哀公“西狩获麟”之太平瑞应，“人道浹而王道备”。就时间而言，《春秋》为三统之新统，即黑统，前面还有白统和赤统，而三世存于《春秋》一统之中，始于隐公，终于哀公，当然也就身处三统之中；就义理而言，三世旨在讲述“以《春秋》当新王”的行王法顺次，而“以《春秋》当新王”又是三统这一科中的一旨，就此，三世自然在三统之中。由于三世处于三统之中，但凡谈衰乱一

升平一太平这个次第都不能脱离三统之外，尤其不能离开“以《春秋》当新王”这一旨谈三世。

康长素曰：“孔子创义，皆有三数以待变通。医者制方，犹能预制数方以待病之变，圣人是医王而不能乎？三统、三世皆孔子绝大之义，每一世中皆有此三统。此三统者，小康之时，升平之世也。太平之世别有三统……”^③。很明显，康长素解三世，三统与董子、何邵公皆不一样，在康长素这里，世大而统小，统在世中，每一世中都有三统，与之相反，董子、何邵公，甚而康长素之前的公羊家们，无不认为《春秋》统大而世小，世在统中，一统之中有三世。^②世在统中，三世渐行而为一统，“以《春秋》当新王”，最终人道尽而王道备足，因而，《春秋》三世之说的重点不在于阐释时间的变化，而在于讲述一统王法的次第。由于新王之法是孔子用书法造就，三世因而从来不是隐公至哀公这段真实历史前进的次序，更遑论世界历史前进的必然规律。圣人不忍天下混乱、民生凋敝，所谓“天下有道，丘不与易”，是以圣人用三世讲述如何在衰世成就新统，如何拨乱重返于王道，却不曾保证太平世就是历史的终结，相反，圣人用三统告诉我们，旧统无论曾经多么美好，终究会走向衰落，周道衰败之际，终得向新统过渡，此所谓“天命靡常，唯德是辅”。

康长素生逢中西交手之初，当时，无论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还是他们新奇的现代民主自由制度，都足以让学人们眼花缭乱，康长素的文章中常常提到“医生开药方”，他自己便迫不及待地给落魄的中国开出了新药方：把传统的三世说改装而与西方进化史观结合，让中国由据乱世过渡到君主立宪的升平世，等到合适的时候，再进入民主共和的太平世，达到世界大同。康长素这一举措固然暗含着他的良苦用心，却不曾想丢掉了经传“三世在三统之中”的圣人用心：当我们仅从三世来理解三世，那么《春秋》之时间观无疑便似西方的进化史观；相反，若从统来理解世，三世的进化涵义减轻，而三统中前后法统之间的承续作用便得到凸显。之所以强调世在统中，更有董子所言“奉天法古”（《楚庄王》）的深意。三

① 《文溢例》为何邵公所著，可惜早已亡佚，如今只得看到徐彦引述的部分。

② 上自《公羊传》，下迄康长素之前，几乎所有治公羊学的学人都不曾把三世从《春秋》中独立出来，因此也从来没人抛开三统循环来说时间。龚自珍有些特别，他曾离开《春秋》语境谈三世，对三世有新解，即太平—升平—衰乱，并运用于清代历史，这对于后来学人变革公羊三世说或有启发。尽管如此，龚自珍最终还是没有脱离三统循环来说历史，因而他也没有完全脱离《春秋》的语境，起到康长素那样决定性的革新作用。

统之为“三”,意义深远,董子所谓“三而一成,天之大经”。道之理,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三统以三为始终,周而复始,穷则反本,是以又成就百世之道。哀公十四年,《传》言孔子作《春秋》“其诸君子乐道尧舜之道与?”子曰:“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民无能名焉。”(《论语·泰伯》)《春秋》乐道尧舜之道,法古就是效法先王之道。三统之道在法古之道,而先王之道又在于法天,故而,三统之道就是奉天法古之道。

四、结 语

《春秋》三世而成一统,三统而得百世之道,背后的道理都在于奉天法古。倘若单独抽出三世来构造历史,不但三世背后的“统”没有了,“天”与“古”也同时被割掉了。换言之,三世在三统之中,三世便在奉天法古之中;三世强调一统王法的次第,重视德行的进步,而非讲述历史时间的进化,因而,《传》之历史时间观更多地体现在三统而非三世之中,它重视王鲁新周故宋之承续,强调旧统与新统间的妥善过渡,而非社会之进化。康长素以“不忍之心”开出

的药方固然也是因着新时代而做出的某种权变,然“权”之要在于“经”,《传》言“权者反于经,然后有善者也”,行权便得遵循“经”之道,若抛开“经”之道而单独用三世来支撑权变的药方,便很可能失掉圣人的要旨。

参考文献:

- [1] 康有为. 孟子微·礼运注·中庸注[M]. 北京:中华书局,1987.
- [2] 陈其泰. 清代公羊学[M]. 北京:东方出版社,1997.
- [3] 康有为. 康有为全集[M]. 姜义华,张荣华,校.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 [4] 苏舆. 春秋繁露义证[M]. 北京:中华书局,1992.
- [5] 朱熹. 四书章句集注[M]. 北京:中华书局,1983.
- [6] 李学勤. 春秋公羊传注疏[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 [7] 胡安国. 春秋胡氏传[M]. 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
- [8] 段熙仲. 春秋公羊学讲疏[M]. 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Three periods in *Chunqiu Gongyangzhuan*

LI Jing^{1,2}

(1. Institute of Marxist Philosophy and Chinese Modernization,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275, Guangdong, China; 2. School of Humanities,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275, Guangdong, China)

Abstract: By reviewing the structure of the three periods anecdote in *Gongyangzhuan* and its interpretation by DONG Zhong-shu and HE Xiu, the study attempts to clarify the main idea of the three periods and return the three periods into the three legitimacies on the basis of the time and philosophical connotations to restore the original essence of the three periods. This restoration has two meanings: first, to clarify the main idea of the three periods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eriod and legitimacy and reject the way to describe the history of in *Chunqiu* by only focusing on the three periods; second, with the combination of the idea of the three periods with that of the three legitimacies, the evolution sense has been decreased and the succession of the three legitimacies becomes prominent. Overall view of the three period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three legitimacies is to rethink the idea of respecting the heaven's willing following the ancient examples in the technology era, which has an alerting effect on the modern thought which emphasizes the progress at present but ignores the succession between the present and the past.

Key words: three periods; law; three legitimacies; *chunqiu Gongyangzhuan*; *ZuoZhuan*; *Guliangzhuan*